

猪肉价涨得快,为啥CPI涨幅低?

国家统计局释疑称,不同消费能力对物价感受不一

20日,国家统计局、北京市统计局举办“统计开放日”,统计专家、学者和来自基层的统计工作者等获邀在北京市统计局参加“数据源头之旅”活动。

不同消费能力对物价感受不一

有网友咨询,为什么发布的CPI的涨幅那么低,而生活中很多东西的涨幅都很高,比如猪肉的价格涨得很快。

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司长庞晓林说,其一是个体和总体的差异问题;第二是地区间的差距,就是地域间的差距;第三是因为比较的基础和标准问题。每个人心目中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第四是统计数据的实质问题。现在从6月份开始,CPI、PPI发布方式改了,提前到每月9日。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总队长、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解释说,CPI是综合了8大类别的消费商品和服务项目的数字;而普通市民印象深刻的一般是生活必需品中单个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再加上每个人关注点不同,消费能力也不同,都可能对CPI数据的感受有所不同。而且各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的权重(在CPI总体中的重要程度)对总指数的影响程度不同,而权重的确定是一个地方总体消费结构所决定的,和个人的消费结构可能很不一致。

他还解释说,普通市民对前

几天、上周或者上月的价格走势比较敏感,从统计学来讲这是“环比”;但CPI是就去年同期作比,是“同比”。而且统计数据是公布上月数据,有一定的滞后性,也会与市民的感受有一定距离。

CPI出炉过程会不会造假注水?

有人质疑CPI统计的真实性,对此,国家统计局现场播放了一个短片。在统计CPI的时候,首先,是把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商品划分食品、衣着等八大类,每一类价格数据都有物价的调查员进行采集,采价工作是生产CPI的基础工作。然后,全国各调查点的采价数据通过网络报送到省级调查总队,经过审计之后下月之前上报国家统计局,审核无误之后会审全国和各省的CPI结果。这是规范统一的采价方案,也是近5万个采价点近4000名调查员的努力。

有人提问说,美国的物价比中国高,但是中国的CPI比美国高,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CPI是相对水平,反映的是物价比去年同期涨了多少。CPI反映的是一个相对的涨价水平。 据新京报

对话

彭非:让数字贴近民众,好



彭非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教授

说这种数据不重要,但如果全民茶余饭后都在关注,那我感觉就过份了。这应该是专业人士,比如资本市场的分析师等关注的事。

现代快报:此轮物价上涨还是比较显著的,我们面对的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

彭非: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涨,和经济发展的某种阶段有关,这种上涨有其必然性。人们往往看到的是货币发行过多,但是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必然性看得不够。一方面,我国物价上涨有货币多发的因素,另外也有炒作的因素,比如说炒大蒜。如果我们从国际的情况来看,就农产品和食品的绝对价格而言,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很低的。如果说农产品、食品价格的上涨对农民有利,我们现在不能讲对农民有利,但如果长期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最终价格一定要反映到生产产品的上游,那么实际上这对缩小城乡的差别是非常有益的。如果大家长期对这种消费有心理准备,甚至有心理预期的话,这个也不一定是坏事。

现代快报:我们说,粮食是食品生产链的源头,而今年以来,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大抢“风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彭非:猪肉价格的上涨和生猪的生产是有关的。我想说的是,猪肉在我们国家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国家就没有这个重要性。猪肉生产有其周期,而且不是自然界的周期,当供过于求或者供不应求时,通过市场来调节它的生产和供应。但由于猪肉在老百姓饮食中的地位特别突出,所以人们对它的价格变化尤其关注,也变得非常敏感。换句话说,牛肉、羊肉的价格变化就很少听到议论。

现代快报:应对通货膨胀,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关键,我们经常说,居民收入应该跑赢CPI,不过,有专家认为,近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呈现增长乏力的态势。

彭非:对这个问题,应该做深入研究:适度的通胀,是不是一种常态?实际上,我们有这种讨论,比如说通货膨胀在什么时候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我们现在对通货膨胀要有一个认识,我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我所看到的当地人,对通货膨胀就习以为常。而我们在哪里呆久了之后,也会慢慢习惯。

快报记者 刘方志

中国观察之樗梓专栏

怪了,县长的简历成了“机密”

29岁的市长、25岁的女镇长。最新披露的一位县长,恐怕比前两者更牛——年龄也是29岁,但却以最低学历创造了提拔最快的纪录,尤为奇特的是,他的工作简历被当地列为“机密”。

根据《法治周末》9月21日的报道,这位牛人名叫闫宁,9月6日,他被调任为河北馆陶县政府代县长。报道称,如果不出意外,在此后的馆陶县人民代表大会上,闫宁将没有悬念地丢掉“代”字,成为县长。记者采访了解到,闫宁中专毕业后就成了一名村干部。在最初的三年里,他曾获得四次升迁,每个任上都是“椅子没坐热就走了”。而当馆陶县群众想了解这位新县长的简历时,却发现只能看到其他副县长

的信息。询问县政府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县长的简历是机密,不便对外公开。

我得庆幸自己能看到这篇报道。一是因为媒体帮我们了解到一些相关信息;二是因为这篇报道没有被删掉——前些时日,网民质疑“29岁县长”的帖子被大量删除,个人博客里的帖子也不例外。当然,这些细节也使我们对于“县长身份成机密”的原因,有了合理判断。

最年轻县长,没问题;破格提拔,也没问题。但这并不等于人们对“干部神秘化”也能给予理解与宽容——连国家领导人的简历都要按规定公开,一个县长的简历,怎么反而成了“机密”了呢?回顾过往那些对所谓“官

二代”的质疑,你就会发现人们质疑的并不是年龄,甚至对“背景”的质疑也不太多。只是干部提拔的程序不透明,才使得大家对被提拔者的“背景”有了追问。“机密县长”这件事也不例外,媒体提到“闫氏近亲属中有两个厅级和三个县级干部”,正是“神秘化选拔”所引出来的信息。

说起来,这种堪称“秘密选拔”的情形并不少见。去年初,温州市龙湾区出台的《关于招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的补充规定》,就属于“秘密招录”——该规定出台于2003年,但并未公开,只限于内部知情,直到2010年才被网民发现并曝光。显然,政府主要领导的任用是不能照搬这一套的,例如县长的任命,

必须经过人大代表投票,但如果代县长的个人资料保密,却也能在人大那儿当选,那恐怕是天下第一笑话了。

不过,媒体报道中提到“如果不出意外闫宁将毫无悬念地当选”,还是令人满腹狐疑。前不久,河南漯河市长吕清华“全票当选”不到5天就被双规的事情,已经让人对某些地方的人大任命是否走过场感到怀疑了。这次,如果不是出了媒体曝光这个“意外”,那非同一般的“机密县长”会不会顺利当选呢?不敢假设下去了。事实上,闫宁在每个岗位上平均只呆半年,却能获评“优秀领导干部”而一路升迁,就足以让我们领教他的神奇了。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

别让“沃尔玛们”从违法行为中尝到甜头

9月20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8月24日,沃尔玛出现严重的假冒绿色猪肉事件。事实上,沃尔玛在重庆五年间因违法被处罚了20次,仅今年1月到8月就被处罚了8次,往往是刚被处罚完又出了更大的丑闻。

一个世界500强企业,一个号称“企业公民”的巨无霸,居然无视中国法律和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诚信羽毛,屡罚屡犯,成为一个屡教不改的“坏孩子”,这难道只是“入乡随俗”的惯性使然?不是,是违法成本远远低于收益,他们在违法行为中获得的真金白银更多。两害相权取其轻,“沃尔玛们”自然会

将诚信和法律抛至脑后,在违法

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了。在这一点上,沃尔玛绝不是单兵作战,相当一些国际知名的跨国企业,都有这个毛病。单说最近渤海湾溢油事件中的康菲公司,其表现就比沃尔玛更加恶劣——不仅根本没有把中国法律当回事,更没有把监管部门和百姓利益放在眼里。

这些跨国公司能够发展到今天,无不是经过数十年的全球闯荡、历练,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法律观念都相当成熟,享有相当的口碑。为什么它们到了中国,就有些忘乎所以了呢?作为一个知名企业,且不说应该具备起码的商业伦理,更主要的是,应该可以明确判断自身违法行

为所造成的后果。而在这一点上,正是因为一些机构的监管松懈,处罚畸轻,让它们敏锐地嗅到了“商机”,它们认为,违法违规经营可以获得较大“回报”,并且屡屡尝到甜头,才会不断铤而走险。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发生漏油事故,支付了几百亿美元赔偿,而我国对康菲公司的最初处罚是多少?区区20万元。今年7月19日,美国第三大零售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就因非法标高部分瓶装饮料价格和向消费者征收过高的饮料瓶回收费,被美国地方法院判决支付110万美元赔款和诉讼费。而在我国,《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对价格欺诈的处罚是“处5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你看,即便查实了要处罚,也只是区区几万十几万,如此,它们怎么会不嚣张?

在同样的商业竞争环境下,如果国际巨头从价格欺诈中获得好处,那么对那些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企业,也是一种不好的暗示,更是一种巨大的不公。现在都说商业伦理缺失,你看,它就是这样一点点流失的。在谴责这些国际巨头的同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加大处罚力度。一旦违规,就罚得肉疼,让其得不偿失。如果真有这个力度,恐怕我国的商业环境会好很多,消费者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副教授)

公民发言

可以封存九成 当成减少公车契机

9月22日是第五届中国城市无车日,在活动当天,广州、郑州、青岛等地方政府机关小客车、事业单位非营运小客车除保留10%的应急公务车外,其余九成车辆将全部入库封存。(9月21日《广州日报》)

“无车日”舶来到中国已是第五个年头了,国人在经历了起起的新鲜之后,普遍都出现了审美疲劳。说到底,人们对良好城市交通的期待,并非停留于“美好的一天”,而是希望“无车日”环保低碳的理念能够植入到日常生活和城市管理当中。

要实现这一点,作为“无车日”主导者的政府,理当身先士卒,尽可能少用公车。广州等地于“无车日”当天封存九成公车,值得肯定。不过,我更期待“无车日”能成为减少公车的契机——既然封存九成公车都可以勉强支撑公务需求,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么多公车?

大量封存公车,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效率未必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一点早就有过印证。2006年中非论坛期间,北京就曾封存公车49万辆,针对一下子封存半数以上公车,北京市交委表示,“49万辆公车入库封存,本市各机关事业单位没有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这透露出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信号——现有的公车至少有一半是多余的。

同理,如果广州等地封存九成公车而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则反映出同样的问题。退一步,就算上班受影响,影响有多大?是不是就运作不起来了,还是仅仅“一些官员没法坐公车上班”而已?既然要封存九成公车,有关部门不妨好好调查一下,看看封存公车对本地交通、环境有多大改善,进而查查封存的公车中哪些是必须用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甚至完全多余的?若能搞清这些,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公车,恐怕就是民众于“无车日”中的一个最大收获了。

(邓昌发)